



戈壁深处的胡杨传奇

——拐子湖气象人的故事

54年，内蒙古阿拉善盟拐子湖气象站先后驻守过13任站长、122名职工，他们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只干了一件事”，默默守望这片早已被联合国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无人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文 | 本刊记者 郑莉 图 | 许之丰 吴超君



“死亡戈壁”上的坚守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的学校、卫生站、粮站、邮局、商店先后撤走,最终,连苏木政府也搬走了。方圆200公里,观测员们每天能见到的只有观测场、百叶箱、茫茫戈壁滩和那几张熟悉的面孔,寂静的空气,仿佛能将所有人吞噬

2013年4月18日清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拐子湖,沙尘暴已经盘桓了18个小时。

天空中,初升的太阳散发着无力而浑浊的光亮,像一团即将熄灭的炭火,忽明忽暗。成排的废弃民居中,兀然矗立着拐子湖气象站的双层楼房。狂风卷起黄沙,猛烈地拍向这座戈壁滩上的“孤岛”。

忽地,大门被用力推开,几个年轻人鱼贯而出,斜刺里冲进狂沙中。大大小小的沙粒抽打在他们的脸上、手上、身上,一会儿的工夫,耳朵、嘴巴里就灌满了沙子。可他们依然手挽着手,坚定地朝100米开外的气象探测场进发。

蹒跚至白色百叶箱前,一个人负责固定箱门,一个人张开外衣挡住风沙,一个人从怀里掏出笔记本,将半个身子躲进“人墙”,铅笔在记录本上写得飞快。

他们必须在8点03分将收集到的气象情况发回交换站。这些数据是天气预报、气候分析、气象服务的重要基础依据,一刻不能晚。

这只是半个世纪中,拐子湖气象站最平常、普通的一个场景。54年间,这里先后驻守过13任站长、122名职工,他们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只干了一件事”,默默守望这片早已被联合国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无人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金黄的胡杨林、红色的红柳丛、白色的芦苇荡、绿色的钻天杨……每年10月,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外的绵延沙丘,就变成了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吸引数万游客纷至沓来。

相距200公里的拐子湖,却是另外一个情景:三面戈壁一面沙漠,无人居住的废弃院落,沙漠上长出的梭梭草被太阳烤得焦黄。

拐子湖有着令人胆寒的绰号——“鬼见愁”。这里年均降水量只有41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4523.7毫米;冬季最低气温在零下31摄氏度,夏季沙漠地温最高达80摄氏度;每年8级以上大风长达100天,沙尘暴常常从4月刮到6月。

在我国的高山、海岛、荒漠、森林等艰险地带,分布着987个艰苦气象台站,按艰苦程度分为1至6类。始建于1959年的拐子湖气象站属于1类,意味着“生存环境最恶劣”。这里是我国仅有的两个沙漠腹地气象观测站之一,距离“死亡之地”巴丹吉林沙漠北沿仅4000米。

不过,比恶劣环境更可怕的还是漫无边际的孤寂。

拐子湖气象站位于温图高勒苏木(乡),与最近的城镇额济纳旗相距230公里。由于沙漠化日益严重,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的学校、卫生站、粮站、邮局、商店先后撤走,一周一次的班车停发,最终,

连苏木政府也搬走了。方圆200公里,常住人口不到20人。

从此,观测员们每天能见到的只有观测场、百叶箱、茫茫戈壁滩和那几张熟悉的面孔;能听到的,只是每天整点无线报话机传出的嘟嘟声。寂静的空气,仿佛要将所有人吞噬。

“拐子湖转来转去就是几个观测员和边防战士,互相熟悉得连对方留在沙漠上的脚印都认得出。”段凤莲1997年跟随男友进入拐子湖气象站。有一阵,她是这里唯一的女性。

有时,她一个人进观测场观测,会觉得一个小时里天空没有任何变化,没有老鹰飞过、没有云朵漂浮,除了温度仪有限的升降,仿佛一切都凝固了。她怀疑自己出错了,走到仪器前,把指数挨个看一遍。看完还是不放心,再看一遍。“那种状态,跟神经病一样。”

渐渐的,拐子湖周围的5个艰苦气象站先后撤销。而拐子湖气象站依然坚守在大漠中,并于2013年由国家基本气象站,升级为国家基准气候站。

“拐子湖气象站是不可替代的。”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局长乌兰斩钉截铁地说。

“拐子湖气象站是不可替代的。”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局长乌兰斩钉截铁地说。

2003年10月15日,我国首个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即将升空。当



刚刚重新修建后的拐子湖气象站，给新安装的篮球架上装篮网。由于这里平时只有6个人，只够半场，所以篮球场也只修建半个

人们激动地等待这一历史时刻到来时，恐怕未必知道，在距发射场直线距离180公里的拐子湖气象站里，气氛异常紧张。

风速、气温、降水、雷暴、沙尘、强对流……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天气变化，都可能对发射产生巨大影响。为了确保天气预报的精准度，气象站观测员们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实时更新着气象数据。

9时，当“神舟”五号飞船从阿拉善戈壁大漠冲天而起。拐子湖气象站所有人松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每天进行8次定时监测、24次航危报监测，除地面测报、生态监测外，还要负责

人工增雨……拐子湖气象站现任站长那木尔用“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地温冻土”和“云、能、天”来概括观测员们的工作。但这些都并非拐子湖气象站作用的全部。

在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里，挂着一张巨大的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分布图，沿着中国与蒙古国的边境线，依次排列着数十个基层气象站，越往西北分布越稀疏。

“方圆11.46万平方公里，只有拐子湖和额济纳旗两个气象台站，收集到的气象监测数据极为珍贵，如果撤掉了拐子湖气象站，相当于在我国气候现象上游出现了一个监测空白带。”乌兰张开双手在地图

上比划着，努力让每个人感受到拐子湖的重要。

阿拉善是北方冷空气和沙尘暴入侵的主要路径之一，其境内分布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亚马雷克四大沙漠。每当蒙古国冷空气或强风进入阿拉善，首先卷起的是干涸的居延海湖底的砂石，然后是巴丹吉林的黄沙，形成的沙尘暴直扑华北及东北地区。而拐子湖气象站是监测沙尘暴的最佳位置，对下游沙尘天气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极为重要。

2003年，拐子湖新增了沙丘移动监测，每半个月，观测员们都要在沙漠中徒步14

公里,收集沙丘的移动情况。2010年,这里建成了内蒙古首个风沙观测试验场,2012年,又建成通量观测站,掌握沙漠演变、扩

张情况。这些都为巴丹吉林沙漠气象研究和生态治理提供了第一手数据,使沙尘暴预报预警更加科学、准确。

“‘蘑菇云’形状的沙尘带像一堵巨墙,剧烈翻滚,横扫大地。刚刚还是湛蓝的天空,瞬间被灰黑色的尘埃包围,仿佛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李福平的描述并非危言耸听。

我国气象史上最著名的黑风暴事件发生在1993年5月5日。高达数百米的沙墙袭击了新疆、内蒙古等地,造成85人死亡,31人失踪,37万公顷被沙土掩埋的耕地绝收。

“黑风暴”是拐子湖人最恐惧的时刻,但风刚刚停下,观测员们就会第一时间拿起铁撬,冲向探测场,“抢救”被沙石掩埋的仪器,被狂风掀翻的围墙。保守估计,他们每年需要清沙5000到6000立方米。

“到了观测时间,就是下刀子也得出去。”那木尔说,每天整点零三分的数据交换时间就是“军令”。越是恶劣天气,越需要密切观测气象数据。如果风太大,大伙就在观测场和值班室中间拉一根绳子,拽着绳子,一步步走进去,用身体筑起“防风墙”,完成观测。

对于观测员们来说,这时候收集的气象数据比命还重要。有一次,为了追回一张被风刮走的观测表格,一位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女观测员竟然随风跨过了一米多高的铁栅栏。

据不完全统计,拐子湖气象人在54年中累计采集了800多万气象数据,发出气象电报60多万份,并创造了一个令同行惊艳的奇迹:全站地面错情率始终保持在0,报表合格率100%。

永不消逝的电波

每天整点零三分的数据交换时间就是“军令”。到了观测时间,就是下刀子也得出去。如果风太大,大伙就在观测场和值班室中间拉一根绳子,拽着绳子,一步步走进去,用身体筑起“防风墙”,完成观测



“哇哇九,哇哇九,三拐八呼叫,三拐八呼叫……”沙尘暴肆虐的夜晚,总会听到拐子湖气象站值班室里传出观测员嘶哑的呼喊声。

自建站起,拐子湖气象站一直使用莫尔斯无线电台,经兰州区域气象中心转发气象报文。直到1990年,才将电报机改为单边无线电台。

每当遇到沙尘暴这样的恶劣天气,无线短波信号就变得“飘忽不定”。担心数据没有发出去的值班员,会不停地“盲报”,整夜整夜地喊。

有时,值班员还会骑上摩托车,跑到几十公里外距离基站近些的山包上找信号。“看过电影《英雄儿女》吗?那姿势就跟

里边的王成一个样。”副站长王毅做了一个背起步话机的动作,单膝跪地,右臂拄膝,冲着手中的“虚拟话筒”喊了两嗓子。

这看似玩笑的描述,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时,就成了真正的“生死考验”。

有年冬天,观测员许延强刚从探测场出来,只听背后轰轰作响。扭头一看,一堵“黑墙”直奔他扑了过来。他拔腿就跑,刚进家门,“黑风暴”就把探测场淹没了。

“如果跑得不够快,干脆趴在地上别动,任由沙子埋了。这种风暴一般持续15分钟左右就过去了。”许延强轻描淡写地讲述着那原本惊心动魄的一幕。

第11任站长李福平在拐子湖气象站工作的5年里,亲历了3次“黑风暴”。





跨越半世纪的握手

1964年，一纸调令，将山西人杨福成送进了拐子湖。当时，拐子湖气象站算上杨福成只有4个观测员，共事了13年，因条件有限，没留下一张照片。更遗憾的是杨家的老二，因为缺医少药，腹泻引发高烧，孩子只活到了4岁。

2013年4月16日，这座“孤城”迎来了十几年中最热闹的一天：曾经在拐子湖气象站工作过的老前辈回“家”省亲了。

年逾古稀的杨福成和王文华手牵着手，像一对孩子，好奇地看看这儿，瞧瞧那儿。“有地下水抽水装置、太阳能发电，用电脑处理数据，还有独立宿舍……30年，变化可真大！”杨福成乐得合不拢嘴。

1964年，一纸调令，将山西人杨福成送进了拐子湖。

“拐子湖，一定有水有草，环境肯定错了。”杨福成跟同行的妻子和孩子说。可这一路真不易。大卡车走了整整三天，“搓衣板”路颠簸得所有人几乎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干净了。进入拐子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杨福成跳下车，一阵风沙刮得他睁不开眼。借着车灯，隐约看到两排土坯房，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亮。

“老杨吧？欢迎欢迎！”三个人举着

煤油灯迎出来，热情地接过杨福成的行李。望着无边际的荒漠戈壁，杨福成一家惊呆了。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晚上黑风刮，家里风沙大。这种地方怎么待？”没过几天，杨福成的妻子就闹情绪了。

“别人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杨福成觉得妻子思想太落后。

要在拐子湖待得住，必须经受八道难关——吃水难、吃菜难、用电难、行路难、就医难、找对象难、通信难、住房难。

喝水问题是所有拐子湖气象人必须迈过的第一道坎。每天，两个观测员要赶着毛驴走三公里，到乡里唯一的水井打水。用梭梭柴围起的井口生出一层绿色的苔藓，附近单位的职工、村民乃至骆驼都要喝这口井里的水。“长期饮用这样的井水身体受不了。”杨福成的几个孩子，才40岁出头，牙齿便掉光了。

当时，拐子湖气象站算上杨福成只有4个观测员，分别来自山西、四川、广东、辽宁。“我们共事了13年，可惜没留下一张照片，那时候条件不允许啊！”

没留下一张照片的还有杨家的老二。因为腹泻引发高烧，孩子只活到了4岁。

“孩子一直喊‘爸爸救我，爸爸救我’。可我没本事救他，对不起他啊！”杨福成想起没来得及长大的儿子，老泪纵横。

拐子湖缺医少药，小病自己看，大病就得跑几百公里进城看。遇上急病，那就要命了。杨福成叹了口气，“可哪里不死人呢？”

杨福成调离拐子湖气象站30多年，这里的条件依然艰苦：夏天吃菜靠自己种，冬天就只有“老三样”——黄豆、洋葱、土豆；围墙被沙子压塌了，要自己清理重建，“拿铁撬比握铅笔时间都长”；改革开放，科技日新月异，可拐子湖依然利用油机发电，为了节省有限的电力，观测员记录数据仍靠蜡烛、油灯、手电照明。

这一切在2010年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国家气象局和内蒙气象局投入600多万元重建拐子湖气象站。一栋800平方米的二层楼拔地而起，解决了住宿难；60千瓦风光互补电站，解决了用电难；新修的蔬菜大棚、新打的深水井、新建的燃油锅炉让职工们吃菜、用水、取暖、洗澡不再发愁。

“条件这么好，更要好好干！”杨福成布满皱纹的手紧握住现任站长那木尔的手。他觉得，前几代拐子湖气象人的苦没白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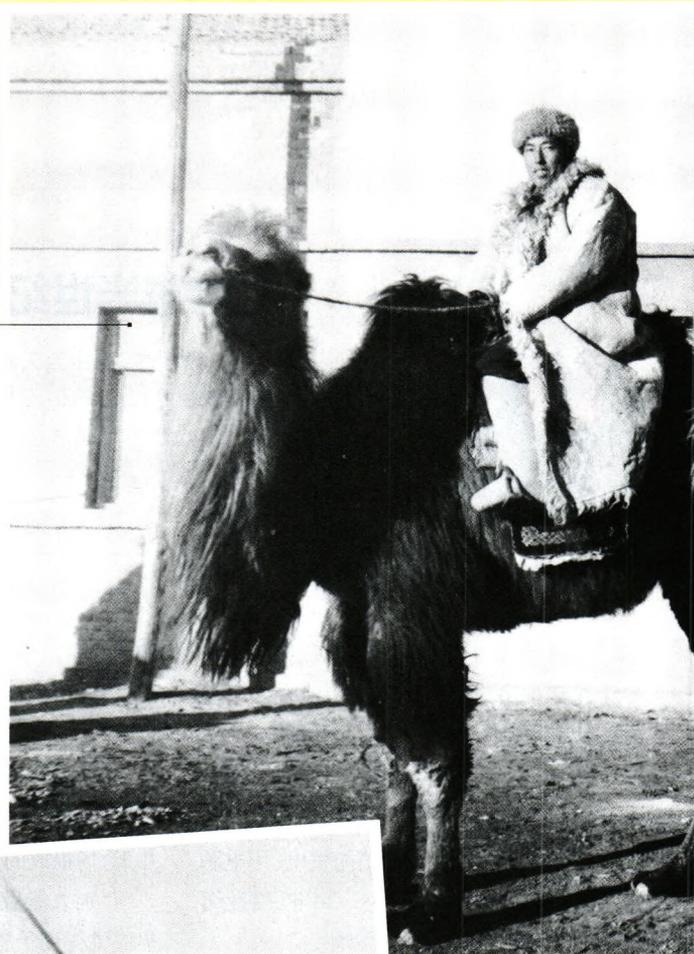
在拐子湖气象站工作过的

122位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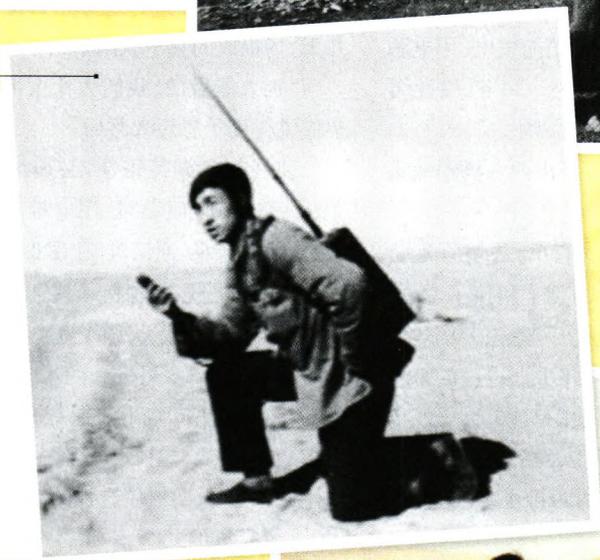
60年代

曹志 陈其陶
 杨福成 董秀英 谢宗本
张江元 孙梦如 伊德玛加布
 王海明 李玉亭 张东生
 解玉莲 姜有莲 李福义 潘金壤
 李锦秀 那生巴依尔 张椒兰 窦宪永
 李玉珍 梁宝忠 仁洪超 王文华 许庭启
 仁学俊 辛宗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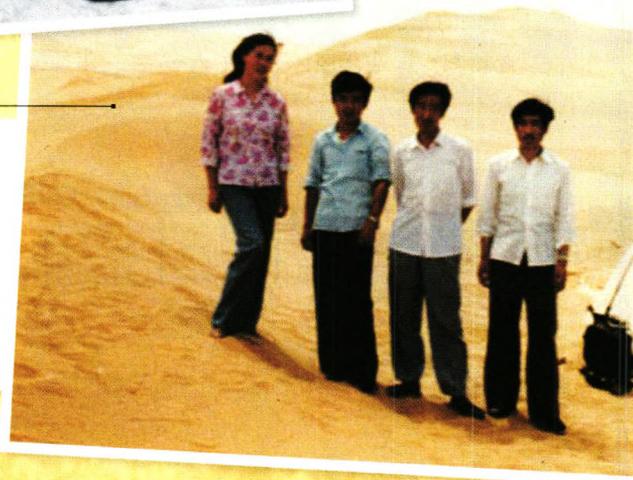
8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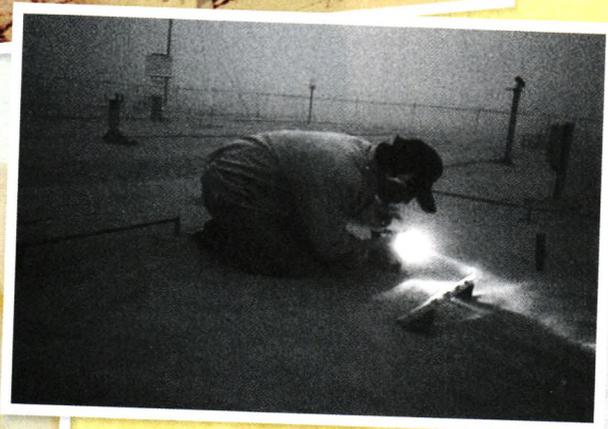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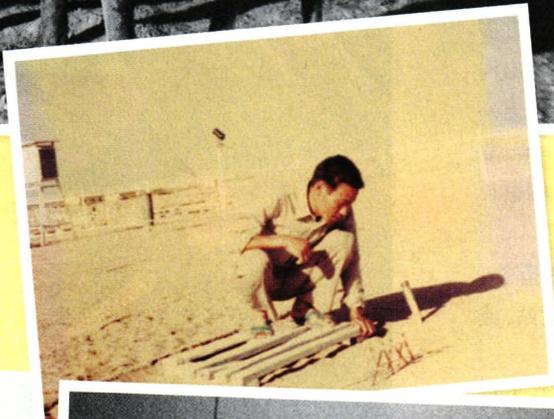
呼炳智 刘福军
 辛秀梅 斯琴高娃
 张九强 梁慧彬 张胜文 徐庆
 段秀花 陈晓红 陈秀华
 刘春莲 张勇 安玉玲 侯开龙
张宏霞 王福祯
 陈润花 刘瑞芳 张广胜
 刘前 余卫东 罗晓尉 王利强
 任尚军 邬勤 巴图



90年代

其木格 魏新东
 达布希勒图 刘玉红
 石永平 张建飞 张国臣
 哈斯 杨亚荣
 刘海燕 王云霞 陈达志





70年代

唐永琳 满生财 冉仁金 潘永琳 姜峰
 增广成 曹泽照 李积爱 卢洪兴 裴永保
 张元 曹天仓 盛兴国 蔡怀和 马军 郭兴福
 黄志武 崔振忠 陈尚员 胡延荣 袁新忠 严福文
 朱成月 赵正成 乔罗续 王金生 张茂谦
 牛孝 杜生泉 高志寿 王爱莲 许兆峰
 张兴 邓万龙



90年代后至今

段志宇 王志刚 冯琳琳 田春生
 刘大明 李海波 王毅 潘竞福 段志忠
 段凤莲 李军义 李发军 李福平 魏新东
 石永宁 齐斯琴巴图 王秀云 宝勒德 那木尔
 王海龙 许延强 蔡文军 于勇

感谢《中国气象报》记者马瑞芳提供的相关资料



大漠上的儿女情长

刚进拐子湖时，现任副站长王毅曾经特别渴望离开。2008年调离后，又选择了回来。在拐子湖这个充斥着黄沙、风向、云图的世界里，儿女情长显得如此遥远。更多时候，身边这班兄弟就是家人

那木尔、王毅、许延强、段志忠、王海龙、蔡文军……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拐子湖的小伙子们忙前忙后，脸上堆满笑容。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多人了！”蔡文军红着脸憨笑。不善言辞的他愿意听别人聊，聊什么都行。

与外界的隔绝始终是几代拐子湖气象人的一块心病。

上世纪70年代在拐子湖工作的胡彦荣，始终无法忘记这样的情景：看到山头上出现一个黑点，全公社男女老少就会跑出门，张开手臂喊着，“汽车班车来了，汽车班车来了”。

一个月才能盼到一次的汽车，意味着远方家人的书信来了。

当手机在全国已经普及的时候，拐子湖依然要靠手摇电话和信件传递讯息。

刚进拐子湖时，现任副站长王毅曾经特别渴望离开。有时脑子里会钻出一个怪念头：从门前的铁塔跳下去，但不要摔死，把腿摔断就行。这样他就可以出去治病了。

就是这个如此渴望逃离拐子湖的年轻人，却在这里一口气干了11年。2008年调离后，又选择了回来。“离开那两年我在一个地方当气象局副局长，管小20号人呢。但是特别想拐子湖，想这里的人。”王毅说。

在拐子湖这个充斥着黄沙、风向、云图的世界里，儿女情长显得如此遥远。更多时候，身边这班兄弟就是家人。

观测员段凤莲与王海龙在拐子湖结婚

生子，他们的儿子得到了站里所有人的爱，也早早学会如何付出自己的爱。刚会走路，便学着大人的模样，举起手电，为值晚班的妈妈当“开路先锋”。

拐子湖的天也不总是沙尘飞扬。不刮风的闲暇，大伙儿会围坐在蔚蓝的穹幕下打纸牌，或者站在沙丘上高歌一曲。更多时候，大家会一起种地，先一锹一锹挖出沟壑，然后开着小拖拉机拉回羊粪，一层土一层羊粪地把坑填好，种下小白菜、韭菜、萝卜。好多人累得起不来床，可看到大棚里长出了新鲜蔬菜，心里别提多幸福了。

2010年，拐子湖气象站接到上级指令：所有人可以选择回到额济纳旗气象站，或者，留下。

在拐子湖驻守了十几年，大部分人极少回乡探亲，家里出了事也从不告诉他们，因为“指不上”。几个小伙子更错过了成家的黄金年龄。回家，是多么诱人的条件。于是，许多人稍稍犹豫后选择离开。

这种心情，在拐子湖气象站工作过4年的额济纳旗气象局副局长罗晓蔚特别能理解。那时候她20多岁，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上级派人到站里考核业务或检查工作。观测员们会一起打扫卫生，再做一顿大餐，像过节一样。“哪怕是考试，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从外边来的人，都会顺便带来家人的书信或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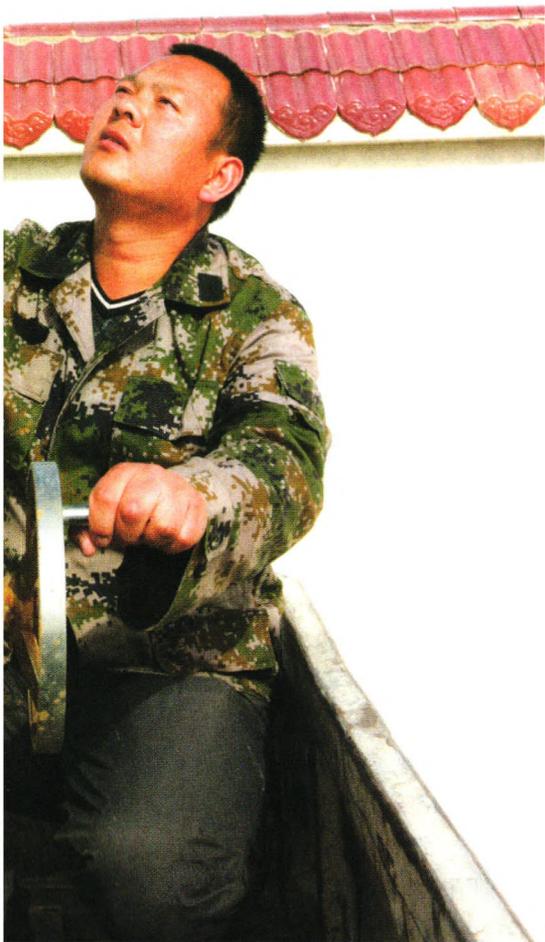
可已经留守了14年的那木尔和年轻的蔡文军没有走：“再艰苦总要有有人留下！”



蔡文军正在检查增雨火箭发射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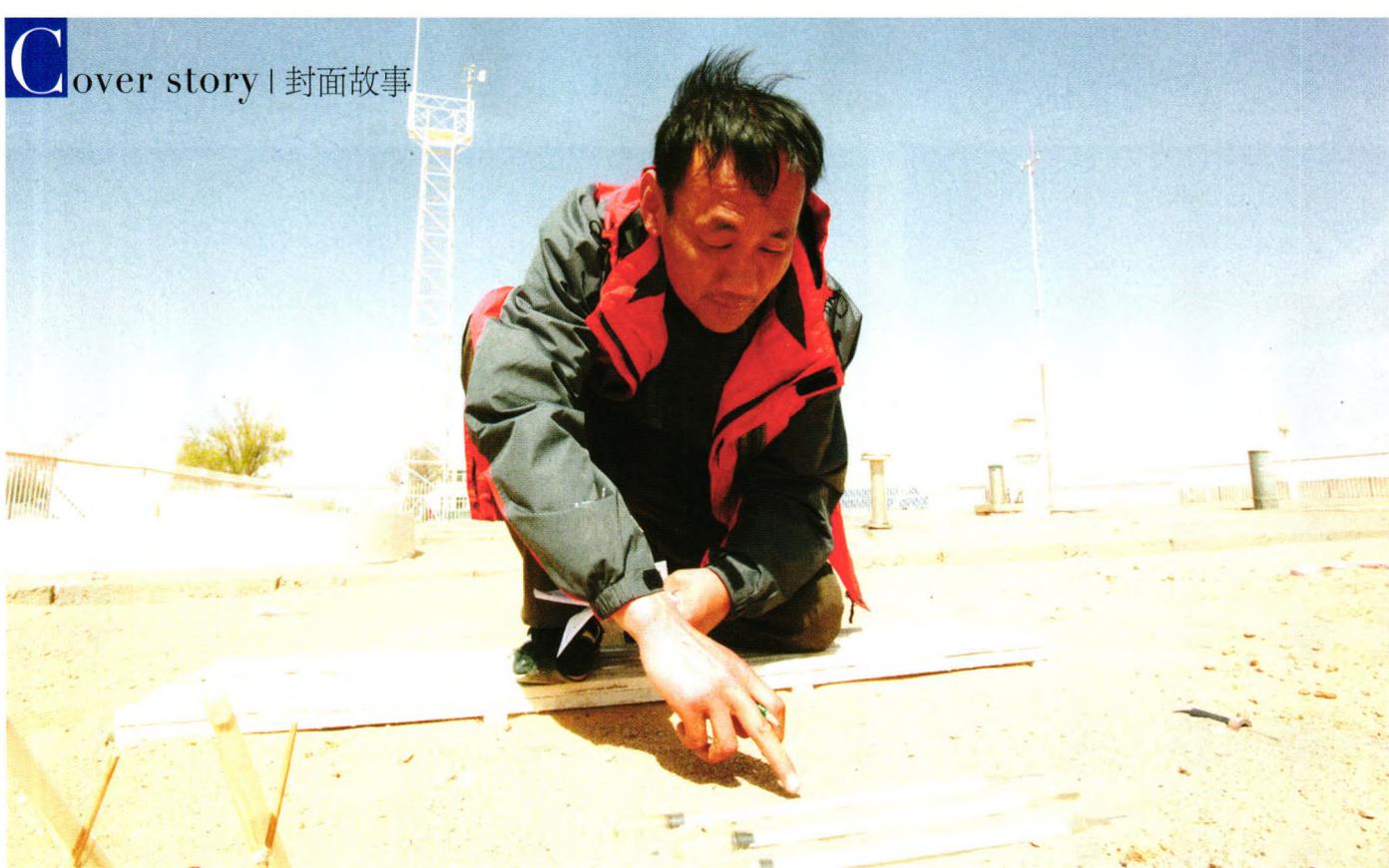
■ 王海龙正在清理观测场浮沙



■ 许延强正在进行蓄电设备检修



■ 许延强正在监测深层地温



■ 许延强正在监测地表温度



神奇的时刻

“天天跟这些数字打交道，确实挺枯燥。不过，我们的工作也很神奇。”每天20点整，全世界的气象人都会同时走出房间，向外发送数据，供全球共享。“我们虽然互相看不到，但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忽然觉得自己干着一件无比重要的工作。”

59岁的观测员段志忠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从气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戈壁滩上的艰苦台站工作。后来，那个站撤掉了，就到了另外一个艰苦站。再后来，也撤掉了。

听说拐子湖气象站有几个年轻人一直打光棍，已经回到额济纳旗享清福的段志忠向领导主动请缨，“让我去吧，至少换两个年轻人出来成个家。我身体还行，还干得动。”

不断有人加入这个艰苦守业的团队：王文华的女儿在拐子湖工作了5年，王

毅的父亲曾经在三个沙漠艰苦气象站工作……“子承父业”的人有很多。

54年，拐子湖气象站驻守过13任站长、118名职工，他们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只干了一件事”。

“天空的高度、云彩的形状、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天天跟这些数字打交道，确实挺枯燥。不过，我们的工作也很神奇。”蔡文军所说的“神奇时刻”出现在每天20点整。全世界的气象人都会同时走出房间，向外发送数据，供全球共享。“我们虽然互相看不到，但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忽然觉

得自己干着一件无比重要的工作。”

拐子湖气象站从未间断的记录，不仅为了解我国的气象变化脉络提供了真实数据，更对全球气象事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吃这么多苦，值吗？”记者追问拐子湖气象人。

“我们采集的数据被用于航空发射、沙漠治理、气象预报，很快还将发到北斗卫星上。人活一世，总该为了国家做点什么！”拐子湖气象人觉得，这样的人生虽然平凡，却不平庸。

如果不当班，段志忠就会挑起两桶水，走上几百米，给院后的两棵胡杨树浇浇水，跟它们说说话。

“这两棵胡杨，少说也有50岁，跟拐子湖站同岁。”段志忠说。

胡杨有着坚强的性格，种子随着风沙飘到哪里，扎根哪里。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每到秋天丰收的季节，那些看似干枯消瘦的躯干上，便一夜间铺满金黄的色彩。

就像拐子湖气象人……